

關於堅定“一國兩制”自信的四點思考

榮開明*

在中國大陸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中國共產黨召開了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大會報告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主綫，總結回顧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全面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的科學內涵，深刻指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總佈局、總任務，明確提出了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基本要求。報告指出：“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一以貫之的接力探索中，我們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九十多年奮鬥、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發展。”“全黨要堅定這樣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¹“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具鮮明特色的極其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有個堅定自信的問題，對於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國兩制”是否也有個堅定自信的問題呢？據我看來，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問題主要在於我們的自信內涵是否科學，依據是否充分，前景是否合乎發展的方向和目標，意義是否重大。下面擬就此談些個人看法，不當之處請同仁指正。

一、堅定“一國兩制”自信的內涵

談及堅定“一國兩制”的自信，首先有一個前提性問題，即自信的“一國兩制”內涵究竟是甚麼。只有弄清楚這個問題，才能明確我們的自信是否科學，是否值得堅定不移。

那麼，甚麼是“一國兩制”的內涵？對於甚麼是“一國兩制”、怎樣堅持和發展“一國兩制”的問題，中央的文獻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作出了一系列的科學闡述，我也對此作過一些研究，發表過較為系統的論述。²我們所說的“一國兩制”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簡稱。即在統一的中國內，作為國家主體部分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作為統一中國不可分割的台、港、澳則建立特別行政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並長期不變。

“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核心鄧小平繼承第一代中央領導核心毛澤東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為了實現中國統一的目標而提出的創造性構想。它是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主要構想和方針，亦為於香港及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所採用。1982年12月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對特別行政區作出專門規定，把“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體現在國家根本大法中，標誌着“一國兩制”思想的正式形成。1983年以後，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在多次談話中，對“一國兩制”的構想作了具體闡述。1984年5月，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獲得會議通過，“一國兩制”成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國策，並逐步提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國兩制”的主要內涵包括緊密相聯的四個方面：第一，一個國家。這是“一國兩制”的根本，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政治前提和基本保證。“一國”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港、澳、台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搞“兩個中國”、

*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一中一台”、“一國兩府”、“台灣獨立”的圖謀，都是背離國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的，都是不能容忍的。第二，兩制並存。這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基本途徑，也是統一後的中國國家體制的重要特色。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國家的主體部分即大陸地區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而非主體的港、澳、台則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兩種制度長期並存，和平共處，但兩種制度的地位是不同的。主體是社會主義，這是前提，在此前提下允許部分地區搞資本主義。第三，高度自治。這是“一國兩制”下，港、澳、台地區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得以長期保持的制度保障。統一後的港、澳、台將依法設立特別行政區，除外交、國防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它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財政獨立；現行的法律基本不變；私人財產受法律保護；自行確定地區內的貨幣、金融、關稅等政策；可使用區旗和區徽；官方正式語言除中文外可包括其他語言。統一後的台灣，還可擁有軍隊，黨政軍系統皆由台灣自己管，並可派人到中央政府任職。第四，長期不變。這是統一後保持港、澳、台繁榮和社會穩定以及促進民族振興的基本保證。“一國兩制”是中國長期堅持的基本方針和政策，不是權宜之計，不是短期的或策略性的打算，而是要長期並穩定貫徹的基本國策。“一國兩制”的實施必須有兩個必要的前提：第一，國家主體部分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第二，必須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因為，惟有強大的國力和高度的現代化，才是國家統一的堅實根基和民族凝聚力的根本保障。

按照“一國兩制”的規定，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區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區基本法》。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已於1997年7月1日回歸祖國，澳門已於1999年12月20日回歸祖國，並對台灣的和平統一工作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的大量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完全正確的。國家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在一系列重要講話中，根據實踐的需要豐富和發展了“一國兩制”理論的內容，特別是對如何正確地處理“一國”和“兩制”等關係作出了明確的表述，對在香港澳門進一步實踐“一國兩制”作出了與時俱進的明確規定。

胡錦濤《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一國兩制’是完整的概念。‘一國’是‘兩制’的前提，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一國’和‘兩制’不能相互割裂，更不能相互對立。‘一國’就是要維護中央依法享有的權力，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安全。‘兩制’就是要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權、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只有把以上兩個方面都落到實處，‘一國兩制’的優越性才能充分發揮出來，給香港同胞帶來實實在在的福祉。”³這是對“一國”和“兩制”關係的經典闡述。

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實踐日益豐富。‘一國兩制’是完全正確的，具有強大生命力。按照‘一國兩制’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符合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為了繼續推進“一國兩制”，報告提出了五條基本原則：“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辦事；全力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着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鼓勵香港、澳門各界人士在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旗幟下和衷共濟，促進社會和諧；加強內地與香港、澳門交流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積極支持香港、澳門開展對外交往，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澳門事務。”⁴

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必須把堅持一國兩制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批地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可偏廢。”報告不僅提出了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的上述一條“根本宗旨”和必須處理好的“三對關係”，還對港澳工作提出了“六條總體要求”：“中央政府將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堅定支持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帶領香港、澳門各界人士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深化內地與香港、澳門經貿關係，推進各領域交流合作，促進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在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旗幟下的大團結，防範和遏制外部勢

力干預港澳事務。”⁵ 這些重要論述也就是當今中國在香港、澳門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偉大綱領和行動指南。這個偉大綱領和行動指南，既是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十多年實踐的科學總結，又是對未來實踐發展的戰略性方向性闡述，充分表明“一國兩制”是集中了古今中外一切國家特別是中華民族實現祖國統一的大智慧，是關係兩岸四地及亞太乃至世界前途命運的重大決策，是關係全域的大戰略，是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具有重大的理論、實踐和國際意義，是科學的可信的。

二、堅定“一國兩制”自信的依據

中國共產黨人對“一國兩制”的堅定自信，既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統一祖國的決心和毅力，又來自改革開放以來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後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十多年的實踐經驗，更來自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和共產黨執政規律認識基礎上的人民選擇，歷史選擇，實踐成就，和對時代大趨勢和歷史發展機遇與挑戰的清醒分析和全面把握。這種自信的依據可以從多個方面多種角度去作分析，其中最為主要的是五個方面。

第一，從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歷史發展看，反對分裂，實現統一是歷史發展的總趨勢。

祖國分裂雖曾多次出現，但統一始終是主流，始終處於主導地位。從春秋戰國到清代前期的一段發展過程中，中國民族大體上先後經歷了三次從大分裂走向大統一的發展歷程。第一次是從春秋、戰國走向秦、漢大統一，第二次是從三國、兩晉、南北朝走向隋、唐大統一，第三次是從五代十國、宋、遼、金走向元、明、清(前朝)的大統一。認真研究這三次持續的大統一，可看出其呈現着鮮明而旺盛的統一趨勢。

——統一的時間越來越長。以秦、漢以後的歷史為例，總體而言，各代統治和統一的時間都越來越長。秦、漢統治共 441 年，其中統一時間為 273 年。隋、唐統治共 327 年，統一時間為 215 年。元、明和清朝前期統治共 570 年，而統一時間達 465 年。統一時間在各自統治年數中所佔比例分別為：62%、66%、82%，呈直線上升趨勢。而與此相反，大分裂時期所經歷的時間則越來越短，如春秋、戰國歷經 549 年(公元前 874-前 221)，漢末魏晉、南北朝經歷了 405 年(公元 184-589)，唐末五代十國僅經歷了 86 年(公元 874-960)。而且，即使在分裂時期，不論是大分裂，

還是宋、遼、金時期的局部分裂，都只是一種重新組合的前奏，是在為新的、更大規模和更加堅實的統一做準備。春秋、戰國之後出現的秦、漢大一統，魏晉、南北朝之後出現的隋、唐大一統，五代十國、宋、遼、金之後出現的元、明、清大一統，都是這樣。

——統一的規模越來越大。夏、商時的統一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區，西周則擴展至長江以南。秦“東至海，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漢通西域。唐朝周邊進一步擴大，“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隱界，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代雖建國不足百年，卻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空前規模的領土大擴張和國家大統一。其統治範圍北至貝加爾湖，西南地區至西藏、雲南皆正式列入中國版圖，又在澎湖設巡檢司，以加強對台灣地區的管轄。明、清兩代，基本上繼承了元代的規模。清王朝興盛期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和穩固更是作出了傑出貢獻，其疆域“東極三姓所屬庫頁島，西極新疆疏勒至於蔥嶺，北極外興安嶺，南極廣東瓊州之崖山”，奠定了今天中國遼瀾版圖的基本格局。

——統一的制度基礎越來越堅實。中國早期王朝夏、商、周的統一主要表現在形式上，而非王朝對地方的直接統治上。以西周為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實行的是王權領導下的封國自治制，只要各封國共尊周天子為“共主”，並履行相應的義務，周天子並不對各封國進行實質性的統治。軍隊、財政、人事皆由封國自決。秦統一後，總結春秋、戰國以來探索和建立中央集權統治的初步經驗，確立了統一中央集權專制政體，在全國推行“郡縣制度”，使皇權和中央的控制力通過郡縣鄉里和什伍組織落實到每一個編戶。又修馳道，鑿靈渠，統一文字、貨幣、車軌、度量衡，通過各方面的制度建設，把全國各地區緊密聯繫在一起。此後，歷代又在這一基礎上對如何鞏固統一作了不斷的探索和改革，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建設上多有發明和創新。如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諸侯國實行“推恩令”和“附益之法”；隋、唐開鑿運河，實行科舉選拔人才的文官制度；元代創立行省制度，並在全國建立起空前龐大而完備的驛傳和急遞系統等。同時，歷代中央王朝對邊疆的管理力度也在不斷加強，管理形式趨於多元化，實施“因俗而治”、多種制度並立的措施。這都使中國歷史上的統一格局隨着制度的完備而變得愈加堅實、穩固。

——統一的思想越來越深入人心。古代中國之所以能夠在一次次大分裂之後又都重新走向統一，而不是國家的解體，與傳統的“大一統”思想是密不可分的。這種思想從春秋時期就初步形成。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是這種思想觀念的文字表達。這種“大一統”的思想觀念，實際上也成了國家由分裂走向統一的強大思想動力，在國家統一中起着積極的維繫作用。秦鯨吞六國，將“大一統”思想變成國家政治生活的現實。西漢立於一尊的儒家思想更是主張“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自此而後的兩千餘年，雖歷經多次改朝換代，但這一思想觀念始終以一種無形而強大的向心力，將中國各民族聯繫、團結在一起。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群雄並立，但各民族政權的統治者大都以統一為己任。“大一統”思想已經滲入中國人的血液中，轉化成了中國人民的政治追求，代表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前進方向，代表了中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願。⁶

可見，中國共產黨按照“一國兩制”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符合於數千年來中華民族歷史上主張統一、反對分裂的大趨勢，是順應這一歷史發展趨勢的善舉，是歷史智慧繼承和發揚的光輝結晶。

第二，從中國近代史看，我們按照“一國兩制”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是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社會發展的必然。

中國作為有着五千多年悠久歷史的東方文明古國，曾經有過很多光輝燦爛的時期，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過傑出貢獻。但在近代工業文明發展中卻因為明、清朝封建統治者的夜郎自大、閉關鎖國而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落後挨打。在1840年鴉片戰爭後逐步淪為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強力壓迫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付出的犧牲世所罕見。據專家考證，1842-1919年主要列強逼迫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達709個，主要戰爭賠款合計195,300萬銀元，相當於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列強通過各種手段侵佔中國領土約173.9萬平方公里。美輪美奐的圓明園被八國聯軍掠奪後焚燒；幾十萬無辜南京百姓被日軍屠殺；美麗富饒的外蒙古遭受肢解；悠久燦爛文化的民族，被淪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悲慘境地。面對如此深重的災難，無數仁人志士都對救亡圖存、中華復興之路進行了艱難困苦探索。在近代史的前80年裏，先進的中國人以前仆後繼可歌可泣的精神，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的方案，先有“師夷長技”、“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繼有“君主立憲”、“中西會

通”的戊戌變法，後有“推翻帝國”、“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其間還發生過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但其結果都表明，在西方曾經行之有效的種種資產階級學說和理論都不能幫助中國人認清自己的處境，提供解放的道路。只有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中國人民中的先進分子才從十月革命的經驗中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得出了走俄國人之路的重要結論。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相結合，在實踐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發揚正確，戰勝錯誤，改正不足，逐步形成了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正確道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從而取得了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中國、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勝利。並在建立新中國後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探索。還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巨大的政治勇氣、理論勇氣、實踐勇氣，實行了改革開放，開創、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啟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新紀元，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儘管中國共產黨在探索革命、建設新路的過程中，確曾由於經驗不足等主客觀因素的局限，走過一些彎路，犯過一些錯誤，但中國共產黨總是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健康力量，自我糾錯，從挫折中奮起，從教訓中前行。這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的確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有着強大糾錯功能、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百多年的近現代史證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朝着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第三，從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的實踐看，“香港、澳門回歸以來，走上了同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濶道路，‘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⁷這些成功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國際交往等諸多方面。

——從政治上，香港、澳門已經按照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由港、澳同胞選舉產生了自己的行政長官，推舉了自己的行政管理機構。馬萬祺說：“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我們澳門人自己選出領導人！400多年，澳門經歷127任葡萄牙任命的葡人總督，佔澳門人口96%以上的華人不僅沒有任何選擇的權利，更絲毫沒有參與的權利。結束了殖民統治，是澳門絕大多數居民數百年來的期盼。”⁸近些年來，

香港、澳門同胞又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發展，文化事業的繁榮，同大陸同胞一樣，共享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獨立自主、民主、自由和尊嚴，得到了世界各國人民的關注、支持與尊重。

——從經濟上看，香港、澳門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儘管香港、澳門回歸之初遭受了東亞金融危機的襲擊，後來又遇到了“非典”疫情的侵擾，近幾年來還遇到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持續震盪，但香港、澳門依靠自身的艱苦努力和背靠大陸內地發展的大力支持和紅利，依然保持了持續穩定的發展。數據顯示，香港回歸 15 年來 GDP 穩步增長，1997 年為 1,763 億美元，10 年時間突破 2,000 億美元，2007 年達到 2,071 個億多美元，2011 年為 2,424 億美元。香港是內地對海外投資的主要首選地，也是內地惟一的超千億對外投資的地區。據不完全的統計，2002 年內地對香港非金融類投資為 401 億美元，2008 年達到 386 億美元，至 2011 年 11 月底投資達 2,812 億美元，佔內地對外金融類直接投資總額的 61.1%。香港股市也正逐漸成為內企進軍國際市場重要途徑，2001 年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僅為 91 家，2009 年上升為 271 家，2012 年 4 月已達 420 家，在香港上市內地企業市值佔香港股市總市值 58.7%，內地企業成交額佔股總金額 70.89%。在香港的轉口貿易中，60% 與內地有關，2011 年，經香港至內地的貨物總額達到 8,610 億美元，由內地經香港轉口往世界各地的貨物達 1.150 萬億港元，地產巨頭紛紛北上淘金，李嘉誠旗下佔 93% 的土地儲備集中在內地。

——從文化上看，各種文化交流日益擴大，文化發展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文化交流擴大是通過人員往來增加實現的，2003 年香港開始實行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當年即有 1,545 次內地赴港工作申請，745 家獲批准。香港、澳門回歸祖國還帶動了旅遊經濟發展。2011 年內地訪港人次 682 萬，2008 年 2,951 萬，2011 年超 4,000 萬。普通百姓感受最深的是，內地人紛紛南下赴港澳旅遊，帶動港澳經濟發展，港澳人紛紛北上，投資興業，合拍影片，賺足眼球。成龍、周潤發、周星馳、劉德華等港澳影視明星，深受內地普遍百姓的喜愛。普通話越來越成為港澳第二語言。2011 年 6 月約 46.5% 的港人能說普通話，比 2010 年提升 13.2%。

——從社會上看，居民生活安定，幸福。港人年均收入從 1997 年的 24,790 美元，不斷攀升，2004 年 32,970 美元，2011 年達 49,300 美元。失業率雖在回歸後有所走高，但近年來一直呈現下降趨勢。2011

年失業率降至 3.4%，比發達國家同年失業率還低。內地一直是港澳食品主要供應地。2011 年內地對港出口食品 360 萬噸，佔港市場 90% 以上的蔬菜，80% 以上的活禽等食品農產品由內地供應，僅全國各省供應蔬菜種植基地就達 767 個，備案的供應香港蔬菜加工企業 237 家。目前香港 80% 的自來水來自廣東東江，46% 的電力是從內地進口天然氣和核電，其中大亞灣核電站每年的 70% 的電力輸送到港。9 年內批轉內地投資移民 1.3 萬家，投資額達 949 億元。港澳人熱衷到內地做慈善，汶川地震後，香港累計撥款 130 億人民幣。這也從一個角度表明，內地和港澳聯繫之密切帶來了大陸和港澳的社會安定，人民幸福。

——從國際交往看，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後，利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大好時機，運用其靈活的體制機制，良好的交通和社會管理，背靠內地大陸，面向全球，互通往來，增長補短，互利共贏，大力發展金融業、旅遊業、娛樂業、貿易業以及新興產業，已經成為國際知名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娛樂中心、博彩中心、旅遊中心、信息中心，大大增強了同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友好往來，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往更為密切，更見成效。

在港回歸 15 週年之時，有關方面統計，香港信心指數：1994 年為 55.6%，1997 年為 76.1%，2008 年達 80.2%。

澳門相關情況有的比香港更好。僅就經濟而言就出現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增長，城市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 2000 年到 2011 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從 490 億澳門元增加到 2,920.9 億元，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由 1.4 萬美元增長到 6.6 萬億美元。整體經濟增長超過六倍，預計 2012 年本地生產總值還有 10% 的增長。截至 2011 年，累計財政結餘超過 2,100 億澳門元，外匯儲備達到了 340.3 億美元。⁹

實踐是認識的基礎、來源和動力，是檢驗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標準。事實充分表明：香港、澳門之所以在短短的十多年內能夠取得如此突出的成效，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我們在實踐中，順乎民意，合乎民心，切實地貫徹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及其理論、方針和政策。

第四，從把握時代大趨勢和歷史發展機遇看，實施“一國兩制”是對時代大趨勢和歷史發展機遇與挑戰的清醒分析和全面把握。

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確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馬克思肯定的“世界

歷史”過程在全球化中深入展開、改革開放已經成為世界不可逆轉的大趨勢下開創的。正是由於上世紀 80 年代中國共產黨對自身所處歷史方位的科學判斷和全面認識，才使得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在蘇東劇變，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處於弱勢、低潮中的不利條件下，把握了機遇，應對了挑戰，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進入 21 世紀之後，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在綜合分析國際國內形勢發展的基礎上，作出了本世紀頭 20 年是中國必須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的重大判斷。正由於這一正確判斷，我們適用時勢的需要，採取了一系列對應措施，取得了十六大以來十年的光輝業績。面對當今世情國情繼續發生巨大變化的情勢，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縱觀國際國內大勢，中國發展仍然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準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全面把握機遇，沉着應對挑戰，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確保 2020 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¹⁰ 我們堅信在這一科學判斷的指引下，未來仍能保持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第五，從思想認識上看，我們堅定對當代中國道路自信、“一國兩制”自信有很足的底氣。這些底氣最為突出的表現是三個方面。

一是豪壯的實踐底氣。歷史和現實實踐充分證明，我們堅定自信的當代中國發展道路，實施的“一國兩制”，是一條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成功之路。正是這條成功之路，使得我們在短短的幾十年內，實現了當代中國綜合國力、民生水平、國際地位、文明形態的歷史性躍升。

從綜合國力看，中國已由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被剝削被壓迫被奴役狀態躍升為獨立自主的新興發展國家。國家經濟總量在世界的排名已由第十幾位躍升到第二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躍升上新的時代高度，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初步實現了大發展，國家應對風險挑戰和抗禦嚴重災害的戰略能力空前增強。

從民生水平上看，我們創造了“中國奇跡”、“東方奇跡”。不僅實現了人民生活從貧窮到溫飽再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而且最大限度地使改革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徹底結束了廣大農民群眾繳納“皇糧國稅”的歷史，正在建構起世界上覆蓋面最廣的“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社會教育醫療保障體系。尤為引起世人注目的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脫貧人口佔世界脫貧人口的 70% 以上，對世界脫貧事業做出了巨大貢

獻，受到了聯合國相關組織的表彰。

從國際地位看，中國已由被擠到世界舞台邊緣，受盡外來凌侮的國家，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的地位作用已得到了世界的公認，加強對華關係日益成為各國政策主流，中國在國防事務中的代表權和影響力進一步擴大，中國對重大國際問題的觀點和態度日益受到各國重視，“中國聲音”在世界輿論中愈加呈現強勁態勢。

從文明形態看，中國正在由農耕文明向着以現代化為目標指向的工業文明升級轉型，朝着新型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共同協調發展的方向邁進。

二是厚重的理論底氣。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成功之路，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指導和指引下逐步形成的，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國情與時代特徵相結合的產物與結晶。它從理論上探索和回答了建設甚麼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甚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甚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它凝聚着幾代中國共產黨人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智慧，是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的高度統一，具有中國性、科學性、人民性、時代性、開放性等重要特質。

三是高遠的政治底氣。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根本目標指向，把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強作為基本着眼點，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不懈追求的價值理想，把推動建設和諧世界作為義不客辭的重要使命。志存高遠，對廣大人民群眾具有強大的號召力、凝聚力、導向力、影響力，理應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全國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以及廣大華人華僑的信念。

三、堅定“一國兩制”自信的前景

如果說上面講的堅定“一國兩制”自信的依據是講的自信從何而來。那麼，堅定“一國兩制”自信的發展前景則是講的自信向何處去，即自信的目標和方向問題。

中國共產黨講的堅定“三個自信”以及由此延伸和拓展的堅定“一國兩制”自信的發展前景，是和中國共產黨確定的現階段發展目標和長遠發展目標，或者說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密切相關的。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經驗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隨着對國情認識的深化，作出了中國還處於

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這一科學判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提供了總依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協調發展，形成了總佈局，還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奠基石。它是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和中國國情再認識的理論昇華，既體現了其一貫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原則，又蘊含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和現階段綱領辯證統一的思想內涵，為我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指明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也為我們的自信確定了發展的目標和前景。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建立起來的工人階級先進政黨。工人階級政黨的先進性和生命力在於指導思想的正確，以及運用這一指導思想分析實際狀況所制定的具體奮鬥目標及其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正確。十八大報告強調：“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要“教育引導黨員、幹部矢志不渝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而奮鬥。”¹¹ 這就明確地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現階段的最低綱領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而奮鬥，更具體地說是為實現中國共產黨早已確定的“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週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最高綱領是追求在社會主義社會充分發展和高度發達基礎上的共產主義。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共產黨人必須為完成黨的當前任務而奮鬥，但心中又必須高懸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在完成當前歷史性任務的時候，又要為將來向更高階段發展準備條件，以便一步一步地接近並最終實現黨的最高目標，把最終目標和當前任務有機地結合起來，正確處理最高綱領同現階段綱領的辯證統一關係。鄧小平說：“過去我們黨無論怎麼弱小，無論遇到甚麼困難，一直有強大的戰鬥力，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¹² “我們多年奮鬥就是為了共產主義，我們的信念理想就是搞共產主義。在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我們採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為了將來實現共產主義。”

前面我們說過，“一國兩制”實施的必要的前提，是國家主體部分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走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努力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我們在現階段實現“兩個百年”奮鬥目標，特別是在2020年時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前景究竟如何呢？必須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十六大提出的新世紀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十七大提出的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新要求，十八大根據人民意願和事業發展需要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確實是宏偉的艱巨的，但又是經過努力可以實現的。比如在經濟上提出的“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經過測算，十八大後的8年，只要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左右，城鄉居民人均年均增長6.8%，即可實現。而此前的十年我們在這兩個方面的年均增長都高於這一增長率，2002-201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是10.7%，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長率分別是9.5%和7.4%。這就為我們實現既定的目標提供了實踐經驗和其他諸多方面的有利條件。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報告說的好：“只要我們胸懷理想、堅定信念，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頑強奮鬥、艱苦奮鬥、不懈奮鬥，就一定能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一定能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¹³ 我們相信在實現了“兩個”百年目標之後，也一定能將中國的社會主義推向中級和高級階段，不斷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並在經過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下，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屆時中國大陸和香港、澳門、台灣兩岸四地的發展也將更加燦爛輝煌。

四、堅定“一國兩制”自信的意義

自信，對於一人來說，是成功的第一秘訣，是自主、自立、自覺基礎上產生的一種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健康積極心理素質和精神狀態。有自信的人，往往可以化渺小為偉大，化平庸為神奇，使平凡的人們，做出驚天動地的事業。科學的理想信念、自信心，對於共產黨人而言，是巨大的精神支撐、精神動力和智慧的不竭源泉。有了這種理想信念和自信心，就能聯繫群眾，依靠群眾，團結一致，所向披靡，戰勝一切人間險阻，達到預期目標。對於“一國兩制”來說，堅定的自信，也有重大的意義。

第一，有了對“一國兩制”的堅定自信，就會在學習型政黨、學習型組織、學習型社會中認真學習鑽

研“一國兩制”的相關文獻、法律、法規、方針、政策、及其思想理論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更加自覺地懂得為甚麼要實行“一國兩制”、怎樣實行“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提出依據、發展歷程、基本內容、精神實質、歷史地位、指導意義，以及“一國兩制”在積極維護當代中國核心利益：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國家發展等的同時，努力擴大和維護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謀求互利共贏，共享人類文明進步成果，推進持久和平、共同建設和諧世界作出應有的貢獻。懂得“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人為徹底實現國家統一、民族大團結的最終路徑選擇”，“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是中國在全球化時代開創的實現國家統一的新道路、新模式”。¹⁴從而成為“一國兩制”的自覺信仰者。

第二，有了對“一國兩制”的堅定自信，就會在實踐中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思想路綫，不斷地深入實際、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及時總結先進經驗，推廣先進典型，認真發現“一國兩制”實踐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採取得力的措施加以解決，攻堅克難，堅定不移地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成為“一國兩制”的自覺踐行者。

第二，有了對“一國兩制”的堅定自信，就會在行動中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鞏固“一國兩制”的政治基礎，加強同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團結合作，做到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標上同心同向、行動上同心同行，全面正確落實“一國兩制”的戰略方針，認真貫徹執行黨的十八報告中提出的一條“根本宗旨”，處理好的“三對關係”，以及對港澳工作的“六條總體要求”，成為“一國兩制”的自覺捍衛者。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後，兩個特別行政區的事務屬於中國內政範疇，但一些外部勢力仍不時對港澳內部事務說三道四，通過多種方式培養和扶植港澳反對派力量，甚至深度介入港澳當地選舉事務，為反對派參選進行協調等。對此，我們要繼續反對，並採取相應措施，更有效地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對港澳事務的干預。

第三，有了對“一國兩制”的堅定自信，還會從歷史和現實的反面典型中，吸取喪失理論信念、自信心而導致滅頂之災的教訓。

社會主義的發展史也和一切事物的發展史一樣，決不可能全是前進，而無曲折和倒退。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由於主

要領導核心層喪失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自信心，而導致的共產黨滅亡，國家分裂，就是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一次重大倒退。這次倒退，不僅使一個包括蘇聯、東歐等十多個社會主義國家改旗易幟，還使整個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低谷，教訓最為悲慘。這場劇變造成的原因確實是複雜的多樣的，可以從諸多方面去作分析。但從思想理論上說，黨內領導層核心成員對社會主義信念的喪失，自信心的喪失，卻是首要的基本因素。導致這場劇變爆發的蘇共主要領導人戈爾巴喬夫，1999年在土爾其安卡拉某大學的一次講話中露骨地袒露了他的心跡。他說：“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我的妻子在這方面堅定了我的信心，她有這種觀點比我還早。我只有身居最高層職位，才能為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我的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當我親自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須清除蘇共和蘇聯的整個領導，我必須清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我的理想是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他還說“當葉利欽瓦解了蘇聯，我離開克里姆林宮時，上百的記者們以為我會哭泣。我沒有哭，因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¹⁵

該講話公開發表後，國內外有些學者對其真實性表示懷疑。但是人們看到，該講話所談的思想和戈爾巴喬夫的世界觀和他的所作所為是完全符合的。另外，“8.19”事件的一位主要領導人在2002年4月的一次內部談話中也曾明確肯定存在這篇講話。他說：“戈爾巴喬夫不只有一張面孔，而且有三張、四張面孔。戈爾巴喬夫幾年前在土耳其安卡拉大學演講時說，他一生的就是要毀滅蘇聯政權和共產主義。他的講話被刊登出來。”據賴莎·戈爾巴喬娃：《我希望……》和《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等披露，契爾年科去世以後，在蘇共中央全會進行選舉的前一天夜裏，即1985年3月10日，戈爾巴喬夫開完政治局會議回到家裏後，對他的妻子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明天召開中央全會，可能提出我領導黨的問題。”說完陷入了沉思，繼而喃喃自語：“在斯塔夫羅波爾工作多年，到莫斯科這兒幹了七年。任何宏偉重大的成熟了的問題都解決不了。仿佛有一堵牆。生活早就提出了要求！”最後說：“不，再也不能這麼生活了。”這番內心表白說明，這個一直想從內部破壞掉他所憎恨的制度的人，對自己多年來無所作為不滿，對這個制度下的生活已無法忍受。他覺得時機到來了，他要付諸行動了。這個行動就是他在就任總書記以後，着手有步驟地毀滅社會主義制度，而舉起“人

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旗幟就是既能騙人，又能達到其政治目的的最佳途徑。在戈爾巴喬夫看來，“必須根本改造我們的整個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應當粉碎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和與其有關的一切東西”，“幾十年來強加給黨的和社會的模式已遭到戰略性的失敗”。他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有“局限性”，列寧“根本沒有”一個“完整的建設社會主義綱領”，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能作為蘇共惟一的指導思想。他還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是嚴重“變了形的社會主義”、“曲解了的社會主義”，是“極權的”、“專制的”、“官僚的”社會主義。因此，改革的任務和目標，就是要徹底摧毀這個制度，在蘇聯實現“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¹⁶ 這也清楚地說明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固然和斯大林的過失、“斯大林模式”即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缺陷有某種聯繫，但根本原因“在於從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¹⁷ 鄧小平在蘇聯東歐劇變前後發表的重要理論說明了這一點。

1980年8月，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中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根本性、全域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¹⁸ 1991年10月5日，鄧小平在會見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國家主席金日成時指出：“真正要出問題，是我們內部出問題，別人拿我們沒辦法，美國也沒辦法。”¹⁹ 1992年，鄧小平在談話中說：“正確的政治路綫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綫來保證。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我們說黨的基本路綫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真正關係到大局的是這個事。”²⁰ 他還指出：“只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一個好的常委會——甚麼亂子出來都擋得住。”²¹

誰都知道，蘇聯共產黨曾是世界上影響最大、存在時間最久、執政時間最長的共產主義政黨。它從

1898年成立起至1991年自動解散為止，走過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歷程，其中執政時間長達74年。在其漫長的發展和執政過程中，曾經取得過震驚世界的輝煌成就。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黨內各方面的消極因素不斷增長和積澱，黨和國家發展由穩定逐步轉向停滯，黨的指導思想也由不斷僵化教條轉致右傾，最後被喪失社會主義理想信念的主要領導者戈爾巴喬夫送終。江澤民指出：“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最深刻的教訓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結是使得已經相當嚴重的經濟、政治、社會、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釀成了制度劇變、國家解體的歷史悲劇。”²² 這個悲劇雖已成為歷史，但其深沉的教訓，卻一直從反面告誡我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拋棄或缺失，對於共產黨是多麼危險！

最後有必要加以說明的是：我們黨正式提出堅定“三個自信”以來，國內外媒體和政界學界人士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絕大多數的看法是正面的積極的，但也有個別媒體和個人出於不同的目的和立場，將我們的堅定“自信”混同為“自負”、“自誇”、“自高自大”、“逞強欺弱”、“霸權”、“封閉”等等。這是明顯的誤解或歪曲。中國詞的含義確實豐富、廣泛，存在着一詞多義的情形。但《現代漢語詞典》說的十分清楚：自信指的是“相信自己；自信心；自信能夠完成這個任務。”²³ 與“自負”、“自誇”、“自高自大”，“逞強欺弱”、“霸權”、“封閉”等的涵義完全不同。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報告也說的非常明白：“歷史昭示我們，弱肉強食不是人類共存之道，窮兵黷武無法帶來美好世界。”“中國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干涉別國內政，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擴張。”“中國人民熱愛和平、渴望發展，願同各國人民一道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而不懈努力。”²⁴ 這就表明我們的自信，恰恰是我們在國際上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堅定不移地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始終不渝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礎和保證。同時報告的結束語還明確指出：“面對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對新的歷史條件和考驗，全黨必須增強憂患意識，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必須增強創新意識，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始終保持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必須增強宗旨意識，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必須增強使命意識，求真務實，艱苦奮鬥，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²⁵

註釋：

- ¹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頁。
- ² 榮開明、劉寶三：《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新探》，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1年。
- 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085頁。
- ⁴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2頁。
- ⁵ 見註1，第40-41頁。
- ⁶ 楊菲蓉、鄭永廷主編：《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92-193頁。
- ⁷ 同註1，第40頁。
- ⁸ 《澳門風雲的見證人馬萬祺》，載於《南方日報》，1999年5月1日。
- ⁹ 吳邦國：《在澳門社會各界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20週年啟動大會上的講話》，載於《光明日報》，2013年2月22日，第3版。
- ¹⁰ 同註1，第15-16頁。
- ¹¹ 同上註，第46頁。
- ¹² 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4頁。
- ¹³ 同註1，第15頁。
- ¹⁴ 齊鵬飛：《從“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載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2年4期，第17-23頁。
- ¹⁵ 戈爾巴喬夫：《我的生活目的就是消滅共產主義》，載於《政治學研究》，2010年第1期。原文載於捷克《對話》(Dialog)，1999年第146期；另載於斯洛伐克《曙光報》，1999年第24期，轉載於2000年8月19日的《蘇維埃俄羅斯報》。
- ¹⁶ 李慎明主編：《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96-398頁。
- ¹⁷ 同上註，第17頁。
- ¹⁸ 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頁。
- ¹⁹ 冷溶、汪作玲主編：《鄧小平年譜》(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32頁。
- ²⁰ 同註12，第380頁。
- ²¹ 同上註，第310頁。
- ²² 見《江澤明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0頁。
- ²³ 見《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1809頁。
- ²⁴ 同註1，第43-45頁。
- ²⁵ 同上註，第52頁。